

CARL GUSTAF MANNERHEIM
MATKA AASIAN HALKI
PÄIVÄKIRJA MATKALTA KASPIANMERI - PEKING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1906—1908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芬)马达汉著;王家骥译.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4
ISBN 7-80069-572-7

I.马... II.①马...②王... III.西域-考察-清后期 IV.K928.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20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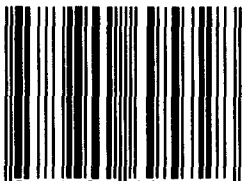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1906—1908)

作 者 马达汉[芬兰]
翻 译 王家骥
校 订 阿拉腾奥其尔
责任编辑 殷德俭

出版发行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100013

设 计 北京践诺电脑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850×1168mm
印 张 40
书 号 ISBN 7-80069-572-7/K·34
定 价 96.00 元

ISBN 7-80069-572-7



9 787800 695728 >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

——代序言

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中国边疆探察史研究中的热点内容,多为学者关注,也日益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一个兴奋点。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却鲜为人知。

王家骥先生翻译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原书的书名为《马达汉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出版在即,嘱我为序。想到本书是由我主持的“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课题重要的子项目之一,实无理由推辞,因而写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一文,权充“代序言”以应命。

—

1906—1908年,芬兰探险家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他的遗迹踏遍了南疆和北疆,又从新疆走进河西走廊,到达我国西北重镇兰州,然后经过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到达北京,行程14000公里。他的西域之旅给世人留下了旅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收藏品等大量有价值的科考资料。他走进中国西部的时间是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二次西藏之行同期。他到达敦煌佛窟的时间则是在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掠夺千年藏经洞经文的前后。

马达汉的芬兰文原名叫 CARL GUSTAV MANNERHEIM,其汉译名马达汉,是喀什噶尔的中国官员袁道台为其签发护照时起的,按其姓氏 MANNERHEIM 的第一个音节 MA,第三个音节 HEIM 的近似音 HAN,取“天马行空,直达霄汉”之意,抑或顾名思义为:马姓者来到大汉的国度。马达汉出生在沙皇俄国的藩属芬兰大公国,是瑞典裔贵族。他毕业于著名的沙俄皇家骑兵学校,曾当过沙皇的宫廷侍卫和御马官。1905年,马达汉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志愿前往我国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马达汉回到芬兰不久,就接到俄军总参谋部指令,要他到中国西部执行一项为时两年的军事侦察任务,目的是探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西北边陲新疆和甘肃的实力影响和清朝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考察中国新疆和西北边境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以便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战略计划。对此,马达汉也坦言:“1906年春天,俄国总参谋部派给我一个任

务,就是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从俄属突厥斯坦到中国的新疆,然后继续穿过中国西部以及甘肃、陕西和山西等省,直到终点北京。这项指令的宗旨在于调查中国北部内陆地区的情况,收集统计资料以及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马达汉日记:《致读者》。】为了掩盖其敌探活动,马达汉以俄属芬兰国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作为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科考队成员,从中亚进入新疆并单独行动。出发前,他在芬兰接受了“芬兰——乌戈尔学会”和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收藏委员会”的委托,进行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历史和语言习俗的考察并收集古代文物的任务。

考察新疆是马达汉中国之行的重点。他从喀什噶尔开始,走遍了南疆和北疆,所选择的路线往往偏离传统的“丝绸之路”,时而翻山越岭,时而溯源逐流,穿越人迹罕至的地方。他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记录气象水文数据,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等。每到一处,他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参观游览,了解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他还特别注重考察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专程拜访了一些民族首领和部落头人,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马达汉对南疆和北疆的险关要隘和军事重镇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并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他也不忘科考任务。在和田古城废墟和吐鲁番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还在各地广泛收集古代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文物。在去北京途中,马达汉专程到山西五台山拜见十三世达赖。当时达赖喇嘛因英国武装入侵西藏而在那里避难。马达汉代表沙皇俄国对达赖处境表示关注和同情。达赖喇嘛则交给马达汉一条白色哈达,请他转献给沙皇。在北京,马达汉完成了给俄军总参谋部写的《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并整理了笔记,誊清了草图。他的《调查报告》长达173页,并附有数十幅自己绘制的或收集的从新疆到内地重要道路、河川和城市方位图以及有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马达汉在报告中叙述了他的军事任务和进入中国后的沿途情况,并对中国的铁路建设、军队、学校、禁毒斗争、工矿业以及日本的影响和边区屯垦情况分别作出评估,然后在结论部分以“中国的西部边陲”为题,提出了战略设想。1908年10月,马达汉从哈尔滨乘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回到俄国圣彼得堡。不久,他即获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召见。马达汉“引人入胜”的报告使原定二十分钟的晋谒延长了一个小时。这种“殊荣”为马达汉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马达汉在为时两年的考察中,横跨了中国八个省份。他学会了讲汉语和维吾尔语中的日常生活用语,他在进行人类学、人文史地考察中对各种物体作了大量摄影,包括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现象、各色人物、人体特征、人文景观等林林总总共1370余幅照片,其中305幅照片已发表在他的《旅行日记(芬兰文版)》中。马达汉把路途所见和调查所得详细地写在旅行日记中,他收集的民族民俗物品、钱币和其他文物资料共计一千多件。在众多当地语言资料中有现代语的,也有古代文字的。此外,马达汉还测绘了3067公里长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方位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达汉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土地上领兵和德奥军队作战,并从一个皇家骑兵团上校团长跃升为一名俄国集团军中将司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芬兰获得独立,马达汉作为沙俄军官亡命回到芬兰,组织白卫军在芬兰内战中击败赤卫军,建立芬兰共和国,担任国家摄政官。芬兰作为北欧小国,地处东西方交界,历来是俄国与瑞典、德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对

象,数百年来一直处于附属地位,先是瑞典王国的东进桥头堡,后是俄国藩属大公国。芬兰独立之路命运多舛,历经内战、芬苏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作为战败国忍受割地赔款的屈辱,但仍保持了独立地位。马达汉在俄国从一名骑兵到沙皇近卫,从骑兵上校团长到集团军中将司令,炼历了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品格。每当芬兰处于转折关头,马达汉都能受命于危难之际,并从芬兰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引导芬兰走上和平独立之路,从而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最高军衔——芬兰元帅,并在77岁高龄时担任共和国总统。

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是个风云人物也是个传奇式人物。少年时期的磨砺,养成了他倔强、勇敢的性格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他丰富多彩的经历,加上神奇的新疆探险,构成了他人格的魅力。尽管马达汉在政治上是具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新疆探险也有军事间谍和科学考察的双重性,但他留下的大量科考资料,甚至他给沙俄总参谋部的侵华军事调查报告,都是历史性纪实文献,都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我国晚清时期的历史、社会、人文、地理和中外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达汉日记于1940年由芬兰——乌戈尔学会整理出版。马达汉日记发表后,引起了世界地理学界的重视,瑞典地理学会授予作者赫定金质奖章,表彰他对“交通不便和与世隔绝的地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考察。1951发表了马达汉《回忆录》,其中游记部分是作者根据日记改写的。1990年芬兰——乌戈尔学会出版了《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该书从马达汉中国之行时所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了87幅,将历史定格于瞬间的老照片的独特魅力,令读者痴迷,心灵为之震撼。

二

在近代外国探险家的考察中,马达汉的新疆考察虽不及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考察著名,但仍占有一定的地位。马达汉的纪实性日记、回忆录,以及大量图片成为今天研究二十世纪新疆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实录。

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叶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即着力倡导开展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而中国边疆探察史是中国边疆研究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推动中国边疆探察史,特别是凝结探察史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我参与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学术组织工作。1990年我收到了刘爱兰、房建昌《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刊《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1期),可说是我对马达汉这个历史人物的初识。当时的印象,一是在众多新疆考察的外国人中还有一个芬兰人,其经历当属奇特;二是对该文的题名大不以为然,考察时马达汉仅是一个俄国军官,怎么能配上几十年后当上芬兰总统的头衔!自此之后,在我们研究工作中开始关注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的情况的收集,遗憾的是此后的几年中,可说是一无所获。在近代新疆考察研究中,马达汉的新疆考察确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春天,我有幸结识了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在芬兰留学并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王家骥先生。他对芬兰的热爱,以及对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的挚着,给

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愉快、融洽地商议了进行 20 世纪初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资料整理和研究事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大力支持下,“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2000 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正式立项。

这项研究工作包括收集、翻译、整理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资料、研究成果以及撰写马达汉评传等多项内容。主要工作由王家骥先后担任,我从组织、协调,以及研究历史背景的提供等方面予以协助。研究工作总体上是在 3-5 年内,完成四項工作:一是翻译出版的《1906-1908 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

二是翻译马达汉新疆考察回忆录和日记;三是收集、整理和翻译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调查报告,国外有关马达汉研发的主要成果;四是撰写马达汉评传。

整个研发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一是,2000 年 10 月由彼得·赛德伯特先生选编,于 1990 年作为芬兰——乌戈尔学会人文科学丛书出版的《1906-1908 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完成翻译,并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选的 87 幅照片是从马达汉中国之行时所拍摄的 1370 余幅照片中精选出来的。二是,2001 年 8 月,《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课题组应芬兰国防部战争史委员会的邀请,以收集马达汉研究资料为主题,赴芬兰进行了为期两周访问。此次访问的目的是:1. 收集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著作、文稿和照片,以及芬兰和外国学者撰写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著作与论文;2. 参观、考察马达汉的出生地、故居、墓地,以及与他一生重大活动相关的地方;3. 与芬兰人文历史地理学术机构和马达汉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4. 考察有特色的芬兰民族、民俗、历史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边远地区(北极圈内)的开发和建设。访问达到了预期目的,收集到有关马达汉研究著作 6 部,论文 4 篇,从马达汉中国之行留下的 1370 余幅照片中选印了 282 幅珍贵历史照片,还意外发现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1905 年所摄乌鲁木齐照片,也一并选印复制。在访问和与芬兰学者交流中,还就开展马达汉研究达成了多项共识。马达汉是芬兰唯一的元帅,曾任芬兰共和国总统,今天大多数芬兰人视之为是芬兰民族英雄。当然,由于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対,以及二次大战中曾一度与法西斯德国“并肩作战”,也多受责难。但,不管怎么说,在芬兰历史上他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历史人物。他的 1906-1908 年中国之行,尤其是跨越天山南北的经历,以及留下的大量文集、图片、实物资料,实是今天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前景广阔,这就是我们访问后的结论。

三是,2002 年 1 月,王家骥著的马达汉研究评传——《马达汉》作为由我主编的《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丛书之一,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运用广大读者容易接受的体裁和文字的马达汉评传,仅以该书所列的 23 种参考书目中芬兰文的作品有 7 种,英文的有 3 种,俄文和瑞典文的各一种,即可知该书的学术含量。

四是,2004 年上半年,芬兰文版的马达汉中国之行日记——《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汉译本也将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如该书译者王家骥先生所言:“马达汉的旅行日记内容极为丰富,他把沿途所见和调查所得详细地写在日记中,内容包括沿途地形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分布、动植物资源、城镇和居民点位置、历史沿革及交通、商业、文教、军事、经

济情况等等,特别是对地方官吏、军队、少数民族、寺院古迹、风土人情和各种见闻作了生动描述。马达汉日记虽属旅行随笔性质,但文笔流畅、生动活泼,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兴味盎然,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王家骥:《马达汉》第254页,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

三

开展十九至二十世纪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活动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这一领域曾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每当想到这一时期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中损害中国主权、私携文物出境的行径,总有一种民族感情感受到莫大伤害的耻辱感。对这种行径,我们不能忘却,也不应忘却!因此,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诸如普尔热瓦夫斯基、科兹洛夫、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波塔宁、瓦里汉诺夫、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华尔纳、橘瑞超、日野强、马达汉等人的考察活动,揭露和批判这些人的活动实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争夺势力范围需要的实质;但是,作为研究者应认识到,外国探险家们尽管每个人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谴责,但应该承认,他们的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我们对他们的研究还很不够,其中也包括对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研究。马达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王家骥在《马达汉》一书后记中所言:“二十世纪初为了俄国的利益,马达汉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作为俄国的间谍,在新疆考察中充当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但作为一个小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受到列强欺压的中国又寄予同情和希望。马达汉在《旅行日记》中,把中国看做与俄罗斯一样的大国。他在《回忆录》中则准确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需要一个坚定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和技术队伍以及新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但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王家骥:《马达汉》第326-327页)如果从十九世纪算起,新疆考察即将跨入第三个百年——二十一世纪,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翻译和评估当是一项急迫的任务。为此,首先是要整理出翔实的外国探险家的新疆考察的资料目录;其次是分别轻重缓急对其进行翻译和整理;最后是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角度进行总结,并着力于进行宏观与微观、多学科相结合的专题研究,特别是应从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高度,开展新疆考察研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作为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察的有机组成,当然是不应被忽视的。

“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课题组织工作仍在继续:马达汉回忆录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尚待编辑出版;马达汉其他的考察报告,诸如颇受学界好评的《访问撒里和西拉裕固族》等还待翻译和整理,西方学界对马达汉的众多研究成果也待收集、评价,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严格说还刚刚起步。我们期望,包括本书在内的我们已做的工作能为中国学者的马达汉研究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可供参考的思路,从而引发中国学者对马达汉研究的关注,并投入其中。

我也希望王家骥先生能按预定计划,继续在马达汉研究工作中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我们要提及的是,“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一开始就得到芬兰驻华使馆各方面的支持。芬兰——乌戈尔学会、马达汉基金会、赫尔辛基大学、芬兰文物局、芬兰文化博物馆、芬兰文学协会新闻中心和芬兰国防部战争史委员会、芬兰国防学院战争史学会等芬兰文化学术机构也都给予我

们大力支持关注。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中芬学界在马达汉研究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3年12月5日 于北京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文版

前言

卡尔·古斯塔夫·艾米尔·曼纳海姆(译注:中文名马达汉)男爵1867年6月4日出生于芬兰故都图尔库附近的阿斯凯辛。他的祖居地是其家族拥有的露西萨里庄园。1887年,他高中毕业后,进入圣彼得堡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学习。完成两年学业后,他成了一名军官,并就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尽管他高中毕业时经过入学考试被赫尔辛基大学录取成为哲学系历史语言专业的学生,但他没有上赫尔辛基大学学习。他在圣彼得堡获得军官资格后,随即被编录入俄国皇家精良军官侍卫队,并且在圣彼得堡与阿娜斯塔西亚·阿尔波娃结婚,生育了两个女儿。

曼纳海姆志愿参加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他的战争经历十分成功:在前线立了战功,并晋升为上校。1906年春,曼纳海姆被派往中国新疆执行侦察任务。此行的宗旨是军事性质的,但也负有其他考察任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芬兰-乌戈尔学会派出了许多学者除了到欧洲外还广泛地到西伯利亚和亚洲别的地方去考察芬匈语族以及其他所谓阿尔泰语族的语言、人文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在西伯利亚鄂毕匈人中进行考察的有阿尔都里·卡尼斯托、乌·特·西莱留斯和克·弗·卡利亚莱宁;在撒摩耶特人中考察的是托伊沃·莱赫蒂萨洛;在更往东方向的阿尔泰语族人中进行考察的有语言学家格·基·兰司铁和地理学家基·格·格兰诺。在这个背景下,芬兰-乌戈尔学会作为曼纳海姆中国之行的资助者为他制定一个语言与人文学的考察计划,也就很自然的了。从后辈人的角度考虑,语言与人文学方面的考察成果确实具有科学意义,而且绝对是亚洲考察遗产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曼纳海姆在出发进行既定的考察之前,就有志于对中国边疆及其状况进行探测的愿望。那个时候,在欧洲人的眼里,亚洲许多地方在地图上尚是空白点,且具有神秘色彩,那里的人民生活状况更是鲜为人知。俄国方面对于与其毗邻的中国边境省份情况了解甚少。曼纳海姆科学考察的动机主要是增加对中亚的一般性了解和知识。这样的动机,通过芬兰-乌戈尔学会的计划安排,也就符合芬兰民族学的考察要求,而且当时大规模的考察传统正在形成之中。

曼纳海姆进行为时两年的考察中,总共骑马走了14000公里,横跨中国八个省份。他学会了讲汉语和吉尔吉斯语,至少能解决一些生活问题。他收集的资料是独一无二的:他拍摄了近1400幅十分出色的照片。其中有305幅照片发表在他的《旅行日记》(芬兰文版)中。他收藏的民族民俗

物品、钱币和其他文物资料共计一千余件。在众多当地语言学资料中有现代语言的,也有古语的。此外,曼纳海姆还测绘了 3067 公里长的道路图和 18 座城市方位图。

曼纳海姆从亚洲考察归来后即赴波兰执行军事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作战。俄国革命爆发,他脱离了俄国军队,并在 1918 年芬兰国内战争中担任白军总司令抗击社会主义赤卫军。曼纳海姆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1918 年春,白军得胜。1917 年 12 月,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允准芬兰独立。曼纳海姆作为候选人参加了芬兰共和国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但没有获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纳海姆获得了芬兰全民的支持。自 1939 年所谓的"冬战"开始起,曼纳海姆出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尽管 1944 年芬兰在对俄战争结束时不得不屈从于苛刻的停战条件,但他却得到了芬兰人民的极大拥戴和高度尊敬。战后,他于 1944 - 1946 年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1942 年,在他 75 岁寿辰时,曼纳海姆被授予元帅军衔。

曼纳海姆在瑞士度过了他的晚年,1951 年 1 月 28 日逝世。1951 年 2 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盛大的军事葬礼。

芬兰 - 乌戈尔学会会长 乌拉·玛雅·库洛宁

2003 年 9 月于赫尔辛基

Johdanto

Vapaaherra 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syntyi Askaisissa lähellä Turkuä 4. kesäkuuta 1867. Hänen kotinsa oli suvun omistama Louhisaaren kartano. Hän kirjoitti ylioppilaaksi Helsingissä 1887 ja siirtyi tämän jälkeen Pietariin Nikolajevin ratsuväenkouluun. Kahden vuoden opintojen jälkeen hän valmistui upseeriksi, ja sotilasura oli hänen kohdallaan selviö, vaikka hän oli ylioppilaaksi tultuaan kirjoittautunut myöskin Helsingin yliopiston filosofisen tiedekunnan historiallis – kielitieteelliseen osastoon. Yliopisto – opintoja hän ei kuitenkaan saattanut päätökseen. Kun upseerin tutkinto Pietarissa oli valmis, hänen kiinnitettiin paikalliseen valioupseerien kaartiin. Pietarissa hän myös avioitui Anastasia Arapovan kanssa, joka synnytti hänelle kaksi tytärtä.

Mannerheim osallistui vapaaehtoisena Venäjän ja Japanin väliseen sotaan 1904 – 1905. Sotakokemus oli hänelle menestyksenkäs; hän toimi rintamalla ansiokkaasti ja hänet ylennettiin sota – ansioidensa perusteella everstiksi. Keväällä 1906 Mannerheim lähetettiin tiedustelumatkalle nykyiseen Kiinan Xinjiangiin. Matkan perimmäinen tarkoitus oli sotilaallinen, mutta sille suunniteltiin myös muita tarkoituseriä. Suomalais – Ugrilainen Seura oli lähettänyt vuosisadan vaihteessa lukuisia tutkimusmatkailijoita paitsi Eurooppaan myös laajalti Siperiaan ja muualle Aasiaan tutkimaan suomalais – ugrilaisten ja ns. altailaisten kansojen kieltä, kansatiedettä ja historiaa. 1900 – luvun ensimmäisinä vuosina Siperiassa matkustivat Artturi Kannisto, U. T. Sirelius ja K. F. Karjalainen obinugrilaisten parissa, Toivo Lehtisalo samojedien keskuudessa sekä idempänä altailaisten kansojen parissa kielentutkija G. J. Ramstedt ja maantieteilijä J. G. Granö. Tätä taustaa vasten tuntui luontevalta, että Suomalais – Ugrilainen Seura toimi taustavoimana myös Mannerheimia varten kaavailluille kieli – ja kansatieteellisille tutkimushankkeille. Jälkipolvia ajatellen matkan kieli – ja kansatieteellinen anti onkin tieteellisesti mielenkiintoisin ja ehdottomasti arvokain osa Aasian – matkan perintöä.

Mannerheimin lähtöä suunnitellulle tutkimusmatkalle motivoi ennen kaikkea hänen kiinnostuksensa Kiinan rajaseutuun ja sen olosuhteisiin. Tuolloin eurooppalaisesta näkökulmasta Aasia oli vielä monilta osin karjoittamatonta ja salaperäistäkin seutua ja kansan elinotot tuntemattomia. Venäjällä tunnettiin huonosti si-

ihen rajoittuvien Kiinan maakuntien asioita. Tieteellinen motivaatio Mannerheimilläkin oli ennen kaikkea yleisen Keski – Aasian tuntemuksen ja tietämyksen lisääminen. Suomalais – Ugrilaisen Seuran toiminnan kautta tämä oli lähellä myös Suomen kansallisia tieteitä, ja mittava tutkimustraditio oli juuri paraikaa syntymässä.

Kaksi vuotta kestäneellä matkallaan Mannerheim ratsasti yhteensä 14000 kilometrin matkan halki kahdeksan Kiinan maakunnan. Hän oppi puhumaan ainakin auttavasti kiinaa ja kirgiisiä. Hänen keräämänsä aineistot ovat vertaansa vailla; Erittäin tunnettuja ovat valokuvat, joita hän otti lähes 1400 kappaletta. Näistä 305 on julkaistu hänen (suomenkielisessä) matkapäiväkirjassaan. Kansatieteellistä esineistöä, rahoja ja muita aineistoja kertyi toista tuhatta kappaletta. Kielitieteellisiä aineistoja on lukuisista paikallisista nyky – ja muinaiskielistä. Lisäksi Mannerheim kartoitti teitä 3087 kilometriä ja piirsi muistiin 18 kaupungin asemakaavat.

Palattuaan Aasian – matkaltaan Mannerheim toimi sotilastehtävissä Puolassa. Ensimmäisessä maailmansodassa hän taisteli niinikään Puolassa sekä Romaniassa. Venäjän vallankumouksen yhteydessä hän erosi Venäjän armeijasta, ja toimi Suomen kansalaissodassa 1918 valkoisen armeijan ylipäällikkönä sosialistista punaista armeijaa vastaan. Tämäkin taistelu oli Mannerheimille voittoa. Valkoiset voittivat taistelut keväällä 1918. Lokakuun vallankumouksen yhteydessä joulukuussa 1917 Venäjä oli luovuttanut Suomelle itsenäisyyden. Mannerheim osallistui Suomen tasavallan ensimmäisiin presidentinvaaleihin, mutta jäi valitsematta.

Koko Suomen kansan tuen Mannerheim saavutti toisen maailmansodan aikana. Hän toimi Suomen armeijan ylipäällikkönä ns. talvisodasta 1939 alkaen ja saavutti kansalaisten keskuudessa suuren suosion ja yleisen arvonnannon, vaikka Suomi joutuikin taipumaan raskaisiin rauhanehtoihin sodan Venäjää vastaan päättyessä 1944. Sodan jälkeen hän toimi Suomen tasavallan presidenttinä vuodet 1944 – 1946. Marsalkan arvonimi hänelle myönnettiin hänen täyttäessään 75 vuotta 1942.

Viimeiset vuotensa Mannerheim vietti Sveitsissä, jossa hän myös kuoli 28. tammikuuta 1951. Hänet haudattiin Helsingissä sotilaallisin kunnianosoituksin helmikuussa 1951.

Helsingissa syyskuussa 2003

Ulla – Maija Kulonen

Suomalais – Ugrilaisen Seuran esimies

致读者

《穿越亚洲之行》这部书是在三十多年前写的。1906年春天,俄国总参谋部派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从俄属突厥斯坦(指包括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译注,下同)到中国的新疆,然后继续穿过中国西部以及甘肃、陕西和山西等省,直到终点北京。这项指令的宗旨在于调查中国北部内陆地区的情况,收集统计资料以及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然而,当我感到在这次长途旅行期间除了执行主要任务之外,还有机会收集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时,我在出发前找了奥托·唐纳参议员并通过他与芬兰-乌戈尔学会和安特尔收藏品委员会(芬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译注)取得联系。他们对我的旅行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嘱咐我收集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以及收藏手抄本或手抄本残片。他们还希望我关注居住在中国北方的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和部落。一路上,我尽可能按照这些指示行事,从而导致了我的原本计划扩大许多。中国中央政府加紧推行新政的情况表明,巨大的“中央王国”正在从千年的睡梦中苏醒,中国的政制正在更新。在这个时候,我的中国之行意义格外重大。

中央政府中的精英们在推行既定的新政时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碍。本世纪初中国遭受了屈辱;列强入侵造成了百姓对洋人祸害的恐惧;中国南方发生了动乱;通过南方报纸和归国留日学生的宣传,启蒙和进步的思想就在那个时候得到扩散,把整个国家一步一步推向改革之路,造成了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化压倒中国的陈旧传统之势,尽管是十分缓慢的;与此同时,行政权力的分散状况、专制的满清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以及无知的劳苦大众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新政形成了持续的障碍,对于过激的行动有时则是必要的减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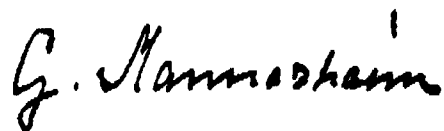
中央政府的新政对全国边远省份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对待正在进行的革新进程,收集这些情况自然是很有意义的。我的旅行所得的印象表明,改革工作在中国内地也已深入。尽管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影响了改革工作有系统的进展,但在有些方面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尤其是在军事机构、铁路建设和教育设置等领域。譬如说,在两三年内开办了4万至5万所欧式学校。然而,困难在于缺少有教养的“改良主义者”和国家财政拮据。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它预示着国家财政的集中。由此看来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伟大的未来;一个新的力量中心将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全世界又将再一次把她当作大国因素而刮目相看。

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推迟对旅行笔记的整理润色,这是我最初打算做的事。

1936 年秋,芬兰 - 乌戈尔学会提议发表我的旅行日记并把我带回来的科学资料加以整理出版。卡尔洛·赫尔顿教授被选为作品的编辑秘书。

在这里,我向所有的人,首先是卡尔洛·赫尔顿教授致谢,感谢他们耗费时间和精力为我旅途中有机会带来的些许资料加以编辑成册。

1940 年 2 月 在芬兰军队司令部 马达汉(签字)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G. Mannosheim".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a prominent initial "G" and a small accent mark over the "i" in "Mannosheim".

LUKIJALLE

Matka Aasian halki, jota tämä teos käsittelee, suoritettiin enemmän kuin kolme vuosikymmentä sitten. Keväällä 1906 sain Venäjän yleisesikunnalta tehtäväksi suorittaa matkan Venäjän Turkestanista Kiinan Turkestaniin ja edelleen halki Länsi - Kiinan sekä Kansun, Shensin ja Shansin maakuntien, päätepisteenä Peking. Tämän komennuksen tarkoituksena oli m. m. tutkia Pohjois - Kiinan sisäosien oloja, koota tilastollista aineistoa sekä sen lisäksi suorittaa erinäisiä sotilaallisia tehtäviä. Kun minusta kuitenkin oli ilmeistä, että minulla tämän pitkän matkan kuluessa ja päätehtävieni yhteydessä olisi tilaisuus kerätä tieteellisestikin merkityksellistä aineistoa, asetuin ennen lähtöäni yhteyteen senaattori OTTO DONNERin ja hänen välityksellään Suomalais - ugrilaisen seuran sekä Antellin kokoelmain valtuuskunnan kanssa, jotka osoittivat suurta mielenkiintoa matkaani kohtaan sekä kehoittivat minua keräämään arkeologista ja kansatieteellistä aineistoa sekä ottamaan talteen käsikirjoituksia tai käsikirjoituskatkelmia. Toivomuksena lausuttiin vielä, että kiinnittäisin huomiota Pohjois - Kiinassa asuviin vaillinaisesti tunnetuihin kansoihin ja heimoihin. Näitä ohjeita koetin, mikäli mahdollista, matkani varrella seurata, mistä johtui, että alkuperäinen ohjelmani huomattavasti laajentui.

Mahtavan > > Keskustan valtakunnan > > herääminen tuhatvuotisesta unestaan, Kiinan valtiollinen uudestisyntyminen, jota keskushallituksen voimaperäinen reformipolitiikka ilmensi, tarjosi matkani ajankohtana aivan erityistä mielenkiintoa.

Kiinan vuosisadan vaihteessa kärsimät nöyryytykset, ulkonaisten vaarojen pelko, kuohunta Etelä - Kiinassa, valistuksen ja edistysaatteiden leviäminen etelän sanomalehtien ja Japanista palanneitten opiskelijoiden välityksellä näyttivät näihin aikoihin ajavan valtakuntaa askel askeleelta uudistuksen teille ja valmistavan, vaikkakin hitaasti, eurooppalaisten aatteiden ja eurooppalaisen kulttuurin voittoa Kiinan vanhentuneesta menneisyydestä, samalla kun hallinnon desentralisaatio, kaikkivaltiaan mandariiniluokan aineelliset edut ja sivistymättömien kansanjoukkojen kova taistelu olemassaolosta muodostivat alituisen esteen keskushallituksen kypsyneimpienkin ja paraiten suunniteltujen uudistusten toimeenpanolle, joskus ehkä terveellisen jarrun liian kiireellisille menettelytavoille.

Oli luonnollisestikin mielenkiintoista hankkia tietoja siitä, missä määrin keskushallituksen reformit olivat vaikuttaneet valtakunnan kaukaisimpiin maakuntiin, sekä miten väestön suuri joukko suhtautui

käynnissä olevaan uudistusprosessiin. Matkani vaikutelmat viittasivat siihen, että uudistustyö myöskin sisä - Kiinassa oli päässyt juurtumaan. Vaikkakin valistuneen työvoiman puute useasti haittasi sen järjestelmällistä edistymistä, eräissä kohdin oli jo saavutettu huomattavia tuloksia, varsinkin sotalaitoksen, rautatierakennuksen ja koululaitoksen aloilla. Niinpä oli esim. parissa kolmessa vuodessa avattu kokonaista 40 000 - 50 000 eurooppalaismallista koulua. Vaikeuksia aiheuttivat kuitenkin sivistyneitten > > reformaattorien > > puute ja valtiotaloudelliset pulmat. Rahareformi oli juuri päätetty toimeenpantavaksi ja valtiotalouden keskittäminen oli luvassa. Kaiken tämän perusteella tuntui todennäköiseltä, että valtakunta oli menossa uutta, suurta tulevaisuutta kohti, ja että vanhan Kiinan raunioille oli nousemassa uusi voimakeskus, joka maailman kerran oli otettava valtatekijänä huomioon.

Ajan puutteen vuoksi on minun ollut pakko vuodesta vuoteen lykätä matkalla tehtyjen muistiinpanojeni muokkaamista julkaistavaksi, niinkuin alunperin tarkoitukseni on ollut. Syksyllä 1936 Suomalais - ugrilainen Seura teki kuitenkin alotteen matkalla pitämäni päiväkirjan painattamiseksi sekä sen tieteellisen aineiston muokkaamiseksi ja julkaisemiseksi, minkä olin mukana tuonut. Teoksen toimitussihteeriksi valittiin professori KAARLO HILDEN.

Tahdon tässä lausua kiitokseni kaikille, ennen muita professori Kaarlo Hildénille, jotka ovat omistaneet aikaa ja harrastusta sen vähäisen aineiston painokuntoon toimittamiseksi, mikä minulla on ollut tilaisuus matkaltani tuoda.

Suomen Armeijan Päämajassa, helmikuussa 1940.

G. Manninen

